

德性教育与选择

张夫伟

(鲁东大学 心理与教育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 人的选择不能逃避对善的追求, 真正有意义的选择是向善的选择, 这为德性的存在与实践提供了可能与必要。德性自身具有善的价值, 体现了人性的优秀和卓越。德性使人的选择自觉向善, 主动为善, 而非勉强为之, 被动为之。从根本上来说, 德性形成的过程就是追求善的过程, 追寻善的生活必定要选择有德性的生活。德性使学会选择名副其实。道德教育要想引领人的选择为着美好生活追寻的, 为着道德自我的生成与完善的, 自然无法回避对德性的关注与教化, 其核心任务自然要指向于自我德性的生成与完善, 这是引领人学会选择的根本之路。

关键词: 德性 失落 复兴 德性教育 规则教育

一、德性的失落与复兴中的选择

回顾以往的道德传统和道德教育历史, 德性很早就成为哲学家和教育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古希腊三哲是德性思想的阐发者与捍卫者,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个人皆非常重视德性在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有完善德性的人。在《申辩篇》中他提醒人们不要只关注于人身和财产, 更重要的是要照顾自己的心灵, 关心灵魂的至福至善, 去努力地“认识你自己”。因为财富并不带来美德, 而美德却会带来财富和其他一切福祉。他认为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 正是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知识即美德”, 认为对知识的追求是获得美德的源泉。如果人只专注于获得钱财和声誉而不关心对真理的思考, 对灵魂的完善是有损于做人的尊严的。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理性和美德思想, 完全以理性作为道德智慧的源泉, 所谓的美好生活就是遵循关于善的理性知识。教育的顶点是关于“善理念”的知识, 因此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引导人关照善的本体, 认识到善是一切存在之根由。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实现各种德性的内在一致性, 从而实现人与宇宙的和谐。“我心中的教育是从童年起所接受的一种德性教育, 这种训练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的渴望, 这个完善的公民愧得怎样依照正义的要求去进行统治和被统治”, “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 都不可藐视教育, 因为当它与伟大的德性结合起来时, 乃是一宗价值无法估量的财产。如果教育腐败了, 它是可以正确地重建的, 每个人在他整个一生中必须尽其所能去支持教育。”^[1] 在他看来, 没有被美德所武装的人, 就没有理想, 没有学问, 没有事业心。他们的眼睛只是往下看, 而不是向上看, 聚集在一起寻欢作乐, 沉溺于物质生活的满足。不仅如此, 一旦将美德从年轻人的心灵中加以扫净, 虚假的狂妄的理论和意见就会乘虚而入, 控制他们的心灵, 于是,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当他们在一个灿烂辉煌的花冠游行的队伍中走在最前头, 率领着傲慢、放纵、奢侈、无耻行进时, 他们赞不绝口, 称傲慢为有礼, 放纵为自由, 奢侈为慷慨, 无耻为勇敢。”^[2]

而亚里士多德则以德性 (arete) 为核心, 建构了一个系统全面的德性伦理的体系。亚里士多德认为, 人天生就具备武器, 凭智谋和德性加以运用, 只不过有些人却极尽可能地朝相反的方面运用。因此, 一旦脱离德性的作用, 人就会变得十分邪恶和残暴, 无比放荡

和贪婪。德性不仅可保证我们选择之目标的正确，还可以保证选择之手段的正确。换句话说，离开德性，将无法担保选择的目的正确。“什么是选择？什么是受美德指导的选择？为什么它是一种欲望？‘我们把肯定善的东西作为选择的对象’，亦即：一个理性主体的沉思，引申出一个人立即要去追求的一种或多种善的结论，引申出一种追求这种善的、具有合理性基础的欲望。”^[3]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美德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人们在理智和实践上直接全面地向善而言的重要性，而且对人们立即做出合理正确的行动选择而言更为重要。因为，若没有美德的参与和作用，就无法探讨选择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邪恶的人错误地从关于善的谬误前提出发进行论证，而纵欲之人则忽视了他有效的健全论证，只有有美德的人才能正确地论证这一结论，即他们的行动，这正是美德在他们生活中所起的两种不同作用的结果。”

现代性对德性进行较早解构的重要思想家马基雅维里认为，前现代人对完美至善的追求是虚构的，在现实生活中根本行不通，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德性论思想。“如果一个人主张人们如何应当依赖美德过日子，那么他就进入了一个虚幻的王国或共和国。古典传统的哲学家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因此进入了《理想国》和《政治学》的理想政体形式。”在他看来，纯粹的美德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德性的追求只是一种幻想，其本质上是一种扭曲了的欲望。因此，马基雅维里指责那些为建立臆想道德和理想国而写作的哲学家，以及那些推崇理想的生活方式而忽略了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的论点。他强调哲学家要充分考虑人类的主要欲望当然是自然性的欲望，而不能引导人们去追求和践行所谓的美德，因为对这些美德的追求会使人对生活感到厌倦，然而，纯粹的欲望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种不受美德约束的纯粹欲望，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存在于自然状态之中。正是由于他对纯粹欲望的强调，标志着人类哲学思想的重大转向。人类开始去追寻什么是人的欲望，如何顺应并满足人的欲望。欲望解放的时代由此开启，“我们的欲望成为一种我们必须尊奉的神谕圣言，它现在成了不容置疑的训示，而在过去提及情欲，则会被认为是我们自身中令人怀疑和危险的一部分。”^[4]

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出现于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方伦理学家或哲学家为了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为人性的存在寻求一种新的合法性依据的结果。社会契约论强调外在的普遍化规则对于人的生活价值，规则取代了德性的位置，古典意义上的德性开始走向了边缘。

霍布斯是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开创者。在霍布斯所描绘的自然状态中，人在本性上是自私的，是恶的，从人性中展现出来的都是权利欲、占有欲、财富欲，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相互之间处于一种每个人对其他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而人又是有理性的，因此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皆按照自己的利益做事，按照自己所倾向的方式运用理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生命自由，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道德规则或道德规范。冲突的解决方式借助于武力。于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大家需要共同制定一些规则，以维护和保障各自对自我生命保全的需要规则就是人们相互约定、相互妥协的产物和结果，也就是人们订立的契约，就是说以契约的形式建立基本的道德规则。道德规则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禁止对人的生命造成伤害，这是人们追求自利自保，保障个体权利，以避免危害个体自我保全权利而进行妥协的结果。

从本质上看，契约论者主张社会是各成员为了各自的私人利益而联合起来组建的组织。社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个人利益不受损害。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目标和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借助于他人的力量否则，目标达成的可能性较小，实现的程度较低。这种思想无疑是把社会作为达成个人利益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结合也完全是利益的驱动。他人在自己眼里，只能是达成别人利益的工具，而自己，在他人眼里，也只能充当工具的角色。

社会契约论支配下的道德生活的目标就是为了人的自我保存，使自我的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续；自我保全成为一切道德的根源，其他一切道德规则的制定都不能违背自我保全。斯宾诺莎在其《伦理学》中主张德性的基础在于努力保持人的自我存在，而一个人的幸福也仅仅在于保持自我的存在。在他看来，自我保存是德性首要且唯一的基础。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指出：“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人们好像在牺牲，但是从来不为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河水是不向河源倒流的，人们也不会违抗他们的利益的激流。”^[5] 霍布斯、洛克皆把自利、自我保全看作是人类道德活动的第一动机，甚至是唯一动机。一旦自我保全成为人选择的最高标尺，其导致的结果将是导致选择的道德性的消失，“一旦自我保全被选为行为的最高标准，其价值就会逐渐且无情地高涨，一直到其他的所有考虑都遭贬值，所有道德或宗教的禁令都被打破，所有是非之心都遭否认和抛弃。”

可以看出，在社会契约论的视野里，道德只具有消极的工具意义，当然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和促进社会的发展，满足人类生活的某些需要，但它却割裂了道德与人类生活的内在关系，抹杀了道德对于人存在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漠视了人类之本性中对道德的内在需求。绝大多数社会契约论者之所以仅仅重视道德的工具性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将道德的视域局限在社会道义规范的层面上，而将古典意义上的德性推到了边缘。社会契约论者虽然在具体主张上虽然各有不同，但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是相同的。无论是在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洛克所代表的古典契约论那里，还是在当今的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诺齐克所代表的现代契约论那里，都基本站在这一立场。

边沁和密尔所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古典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这一情况在 20 世纪后半叶又发生了转折。20 世纪 70 年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深刻批判了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恢复了社会契约论传统，立足于康德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力图重构康德的规范伦理学，主张“权利优先于善”或“正当优先于善”，实现了规范伦理学的复兴。康德伦理学的根本思想就是只有出于义务或责任的选择才是道德的选择。

康德认为，无论在世界之内，还是在世界之外，惟有善良意志是自足的，唯一的无条件着，是最高的善。就其自身而言，它自为地就无比的高贵。它是日常生活中所有选择的前提。任何一种选择若不以善良意志为出发点，其结果都可能变成极大的恶。善良意志所固有的无可估量的价值取决于它的行为准则摆脱了一切只由经验提供的偶然原因的影响。它不因它所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达成的目标而善，而仅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自身之内就具有价值。人的德性若离开了善良意志，其自身的德性就会丧失，并很有可能变为不道德。不以善良意志为基础的德性已经失去了德性的本性，而不能再称之为德性。康德认为责任是善良意志的体现。一个选择要具有道德价值必须是出于责任的，而合乎责任的选择不一定具有道德价值。并且，一个出于责任的选择，其道德价值决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也不与任何欲望对象有什么关系，也不取决于其所达成的结果，而只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一个选择之所以是道德的，就在于其对道德律令的尊重，在于他做事情时的道德动机是否纯正，即看他是否是因事情本身而采取的行动。人之为人的尊严，在康德看来，就是人对道德律令的尊重和遵循。而康德“心中的道德律令”，是可普遍化的“绝对律令”，是每个人都认同的。在他看来，遵循了绝对律令就是理性的，就是自由的，反之，就是非理性的，不自由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的伦理学被称为义务论伦理学，其核心思想概括来说，就是以义务为出发点和根本依据，也可以说是为义务而义务。

新自由主义伦理学强调“权利优先于善”或“正当优先于善”，强调个人权利优先，认为个体权利的正当合理性是第一位的，非常重视社会和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从而高度重视普遍化规则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而忽视德性的作用和力量。道德教育的重心和主要任务也变成了规则教育，古典意义上的德性教育走向了没落。现代伦理学以道德法则为核心。这样，德性观念中原来所包含的肯定的、主动的和积极的内容就消失了，道德行为成

了单纯地服从法则的问题，德性也蜕化为仅仅对道德法则的服从，道德规则成为道德生活中的根本标尺。对于此点，麦金太尔、桑德尔、泰勒等人都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泰勒强调在善的视野被完全忽略的同时，道德哲学关注的对象仅仅在指导行为的原则、诫令或标准上。道德只狭义地关心我们应当做什么而不再关心什么东西本身是有价值的，或者是我们应该欣赏什么，热爱什么，追求什么。麦金太尔认为，现代道德观念最重要的变化是德性由复数变为单数。在古代和中世纪，当德性与实践和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时候，实践和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德性的多样性。现代社会破坏了古代和中世纪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一体化。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在道德上表现为德性内涵的单一化。具体来说，麦金太尔认为现代德性已经完全抛弃了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德性内涵，也不具备一种与规则相区别、相对照的作用和功能，而演变为现在的单一德性，这种单一的德性就是对道德法则的服从，而德性则被定义为服从道德法则的气质。这一思想在罗尔斯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一种行动的欲望来自于相应的道德准则，而德性则是一种为较高的有序欲望所调节的多种相互关联的倾向，德性成为纯粹个人性的道德意愿和欲望。麦金太尔一再强调现在的道德已经不同于历史上的道德，因为那曾经在历史上是道德的东西，明确说来就是体现人性中优秀与卓越的因素丢失了。“不论人们公开承认的理论立场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好像人们现在所想、所说和所做的都表明情感主义是正确的。情感主义已变得具体体现于我们的文化中的当然，我这样说，不仅仅是主张现在的道德已不是历史上的道德，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历史上那曾是道德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消失了，而这标志着一种衰退，一种严重的文化丧失。”^[6]

麦金太尔对德性的强调与呼吁，正是看到了无论是个体的道德生活，还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单纯地依靠道德规则的制定与遵守是无济于事的，无法实现普遍规则的理论设想。善是人类生活追求的目标，而德性恰恰是实现人类生活善的内在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善本身也是一种共同体的善，从而德性也是构成共同体的善的内在条件，“构成人类的善是人的最好时期的全部人类生活，德性的践行是这种生活的必要的和中心的部分，并非仅仅确保这种生活的准备性实践。这样，如果不参照德性，我们就不能恰当描述人类的善。”^[7] 所以，在他看来，没有德性，就没有正义，就不会有人类生活的幸福。现代人面临的生活意义的困境与危机，导致的道德的无序与混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德性的缺失。麦金太尔对德性的强调和重视绝对不是荒谬之论，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深刻揭示了现代人在道德生活所存在的危机。正是麦金太尔对德性在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价值的强调，唤起了人们对德性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道德学家开始深刻反思新旧规范伦理的缺陷，反对把道德原则和道德规则普遍化、抽象化和技术化，反对把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认为是道德的根本体现，而重新关注德性的价值，强调德性对于人的生活的重要性，要求恢复德性对于道德的根本性意义。

在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面临道德危机与道德困境的问题，很多学者在肯定规范伦理及其价值的基础上，也对德性伦理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呼吁德性伦理的重要性，呼吁恢复德性在道德中的地位。国内学者陈根法的如下一段话，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点出了人们重视德性在当代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上看，追求德性的意义和价值已日益变得重要。现代人随着他的横向性的知识的不断扩大，他们对他们要达成的目的和手段已愈来愈清楚了工具性思维的发达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现代人将一切都外在化、对象化，并对这些外在化、对象化的存在物加以攫取。这一病态的现象，在唯利是图价值观念支配下，使世俗取代了理想，功利取代了德性。而匡正时弊正是今日我们重提德性之意义的目的和用心。”

二、德性的意蕴与选择

既然德性对于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如此重要，那么人的选择若是为了道德自我的生成

与完善，那它能否脱离德性的力量？若不能，德性到底在人的选择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又是如何作用于人的选择的呢？

人作为道德的存在，价值的存在，总是不断地追求自身多方面的发展和完善；而德性则可以很好地体现人性发展的状况，规定人精神发展的方向，同时又在人们日常的道德生活中支配着人的选择，使选择尽可能地合乎道德，合乎人性。离开德性的生成，人精神的超越和存在的完善就必定会落空，就很有可能导致自我心灵的封闭乃至窒息。亚里士多德指出：“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全无益处了。”^[8] 又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有意图的选择，其目的正确性的原因是德性，德性实践的直接后果便是采取一种正确行动的选择，因此，德性使选择成为向善的选择的核心所在。著名教育学家鲁洁先生把主体的德性看作是享用美好世界的“器官”，认为德性可以使人体验到实际存在着的他人的善良，洞察到人性中向善的可能、求善的潜能，相信人类社会走向理想与完美的趋势，并进一步强调只有一个德性得到充分发展与完善的人，才能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感觉、理想与希望，充分享受生活。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处处体会到他人对自己的爱意及善行，从而经常对他人心怀感激，使自己沐浴于人间美好的情怀之中。现代人的许多孤独、失落与痛苦正是由于人缺少德性而引起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德性使人成其为人，德性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从道德的角度讲，成就道德自我，从根本上意味着成就德性。没有德性就无法体现真正的人性，没有德性作为人存在的根基和依据，人性就很可能沦为兽性，而使人与动物无异。德性不仅实现了自我存在的完善与提升，而且还保障人与他者处于一种和谐状态，保障成就自我与成就他者的统一。在此意义上，德性也是构建社会共同体的根本条件。把德性的生成仅仅看作个人的私事而将其限定在私人领域，是不合理的。

我们主张人的选择要合乎人性，合乎道德，离不开德性的力量和作用，并不是对人实行禁欲，也不是要限制人的自由，而是要使人的欲望接受德性的引导。对欲望的控制并不是要消除和杜绝欲望，否认欲望存在的价值，因为欲望本身是无所谓好坏、善恶的，但对欲望的追求和欲望的满足方式却有善恶之分，因此，要对欲望进行合理的控制与正确的引导，“我们必须区分那些与人性吻合因而对人而言是善的，以及那些败坏了他的天性或人道因而是坏的人类欲望和喜好。如此我们就导向了一种生活、一种人生的观念，此种生活是善的，乃是因为它符合人性。”自我不是被欲望所支配，所奴役，而应是欲望被自我所引领，所控制。自我是欲望的主人，不是欲望的奴隶，苏格拉底指出：“一个不能自制的人和最愚蠢的牲畜有什么分别呢？那不重视最美好的事情，只是竭尽全力追求最大快感的人，和最蠢笨的牲畜有什么不同呢？”^[9]

那么，德性是如何控制或引导或以其它方式作用于人的欲望的呢？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人的灵魂分为理性、欲望与激情三个部分。如果理性处于支配地位，欲望与激情受理性所支配，则说明人的灵魂是和谐的，反之，则是不和谐的。理性实现了灵魂的统一与和谐，因为只有理性才能保证不同的成分履行各自的功能而不越界。由此可见，在柏拉图看来，欲望和理性，是截然对立的，而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人的欲望总是不好的，因此也就不存在合理与不合理的欲望之分。因此，对于欲望，理性就是控制，而不是进行沟通或者引导。“这两者（理智和激情）既受到这样的教养、教育并被训练了真正起自己本份的作用，它们就会去领导欲望——它占每个人灵魂的最大部分，并且本性是最贪得财富的——它们就会监视着它，以免它会因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份，企图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10]。关于此点，麦金太尔曾作过如下评论，欲望冲突的实质是为人提供了一个在欲望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而柏拉图关于灵魂划分的学说使冲突成为一场激烈的竞争，而且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不是面对着我的欲望，而是被分裂成两个独立的部分，理性和情欲，或者说我就是理性，正在

与情欲作斗争。

亚里士多德虽然认识到了欲望和理性之间存在着冲突，但却不像柏拉图认为的那样存在着必然的冲突，他强调对于欲望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加以区分，从而强调了欲望在人的生活中的价值。对于人的欲望，理性是可以加以引导与调控的，而不是完全进行控制的，并且他认为人们对情欲的关心是为了理性的，对身体的关心是为了灵魂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之为德性，就在于人不是神，自然存有无法根除的欲望，然而人却能正确运用理性，控制欲望的不良影响，形成好的德性品质，从而避恶趋善，形成德性，“人欲没有止境，除了教育，别无节制的方法。”根据麦金太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没有德性，欲望便不可能受理性指导，不可能有效地变成理性所要求的那种欲望。合理的欲望在实践中的有效性依赖于人的美德，而且，正是德性的力量，不仅排除了生理欲望的影响，而且根本不会再让它们影响一个完全有理性的主体。因而，一个进行选择的判断之所以是真实的、有合理根据的和有效的，仅仅是因为美德在这个判断的起始和内容的形成上起了作用，正是美德才使欲望成为合理的欲望。道德教育不可能忽视人的欲望，其关键是合理地区分和控制人的欲望，使人的欲望服务于道德自我的精神建构。欲望虽然和理性是冲突的，但却不是无法联系的，对欲望的调控，需要理性的力量。“对高尚意义的深刻理解要比对仪表的感受来得迟一些，但是，这种理解是由感觉经验作好准备的，而且实际上包含在感觉经验中。因此，感觉渴望什么和理性后来认为善是什么，二者并不相互抵触。教育不是教训儿童违反他们的本能和乐趣，而是在他们感觉什么与他们能够和应该成为什么人之间提供自然的延续。但是，这是一种失传的艺术。如今，我们已经来到完全相反之点。”^[11]

苏格拉底非常重视理性在人的生活中的重要价值，是理性而不是非理性支配着人们的选择和生活，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物的根本性标志。因此，他反对智者派从感觉主义出发，只重视个人的主观感受与喜好，让人们按照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去认识那些能使他们获得个人利益的东西。在苏格拉底看来，如果人的选择仅仅依靠感觉而不借助于理性或理性的知识，其结果往往会导致黑白混淆，是非颠倒。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包括两个部分：理性和非理性。而灵魂的理性部分相比较于非理性部分，其地位显得更优越与崇高。在他看来，只有理性才能体现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所在。作为亚里士多德思想在 20 世纪的继承者的伽达默尔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实践固有的基础构成了人在此世界上的中心地位和本质的优先地位，因为人固有的生活并不听从本能驱使而是受理性的指导。从人的本质引出的基本倾向就是引导人的‘实践’的理智性”^[12]。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功能界定为灵魂遵循或运用理性原理的一种活动，“我们所说的有德者或道德完美的好人，其实就是一位能够遵循理性而生活，将他自身的理性功能发挥得很好的人。”^[13]假如一个人想过一种高尚的生活，追求人的尊严，就应该让理性来主宰和驾驭非理性。反之，如果人选择另一条道路，让自己的理性听命于非理性，即选择以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为乐，且置于优先的位置，最终结果，他将沦为与动物无异的地步。他明确强调自我放纵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耻辱，因为它与人类的行为不相适应，反倒与禽兽的行为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对应于灵魂中理性和非理性的部分，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他之所以将其分为这两种，其首要依据在于两种德性的获得方式是不一样的。理智德性通过教育获得，而伦理德性则是通过习惯性行为实践获得的。但二者之间决不是断裂的，或不相关的，恰恰相反，两者是密切联系的，而又不能分离的。因为人要把先天的那些潜在的东西变为伦理德性，就必须按照正确的理性加以锻炼。理智德性的运用使一种先天气质与那种相应的德性有了根本。反过来，实践理性的运用也离不开伦理德性的作用，离开伦理德性的作用，就可能导致手段与目的的断裂，使理性服务于非善的目的，而理性也就变成了一种狡诈的能力，或现代人所谓的小聪明，理性被误用。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

强调，“理性的教导在先，还是习惯的教导在先这两者需要彼此一致，一致之后方能产生最佳的效果。因为理性有可能偏离最优良的宗旨，而习惯的力量也同样难以幸免”。德性，特别是伦理德性一旦形成就变得稳定可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的形成决非一时之功，人的某一次体现道德的行为并不能说明他具有了某种德性。伦理德性的价值在于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每一个行为的正确目的而实践理性^①（也可以翻译为明智或实践智慧），作为理智德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意义就在于为我们选择达到每一具体目的的正确手段，并且这种手段要以对幸福的全面考虑为坐标。“明智与道德德性完善着活动。德性使得我们的目的正确，明智则使我们采取那个目的正确的手段。”“与没有德性的情形一样，离开了明智我们的选择就不会正确。因为德性使我们确定目的，明智使我们选择实现目的的正确的手段。”^[14]如果只有伦理德性而没有实践理性，则正确的目的就会因为缺乏正确的手段而无法实现如果只有实践理性而没有伦理德性，则有效的手段就可能被错误的目的所利用，而服务于错误目的的聪明才智并不配称为实践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理性从根本上是不能同人生的根本目的是相违背的，一个具有实践理性的人总是会选择根据他思虑认为是道德上正当的事情，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认为具备实践理性的人必定是好人伦理德性是灵魂养成的优良习惯，它可以保证我们的行为总是趋向正确的目的。但伦理德性本身不包含考虑与反思的因素，因此需要灵魂中理性部分的帮助实践理性作为一种特殊的理智德性，其价值就在于理性地思考跟道德选择相关的种种因素，以寻求达到目的的正确手段。因此，人的伦理德性的形成是无法离开人的理智德性的。任何伦理德性的形成都必定蕴含着理性的因素。离开理性的参与，德性的形成就失去了源泉和动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不仅是符合正确规则的状态，而且也是蕴含正确规则临在的主体，这就是德，而实践理性就是有关这种事情的正确规则。正是由于此，麦金太尔对亚里士多德作了如下的评价，“那些现代戏剧完全不可或缺的人物，其中包括那些以价值中立的方式把达到目的的手段相比较的专家，和那些比比皆是的没有实际精神缺陷的道德家，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里或者是在古代传统中很难找到真正的相似者。在实践理智与德性之间的联系牢固建立起来的任何文化中，要奉迎官僚式的专家确实是非常困难的。”^[15]

选择不仅仅表示人的行动是自愿的，还意味着人对个人的能力与素质、对自己生活的最终目的、对当下行动的目标与生活目的的关系、对行动的情景和后果有清楚的判断。由此可见，选择的生活理应是理性的生活，人的选择离不开理性的参与和力量，理性指导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和比较分析后做出最适合自我的选择。现代人所面临的选择困境迫切需要这种理性精神的回归与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只有依托于这种理性精神，才能帮助人在现实世界中走出选择的困境，实现生存样式的转变，走向不断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生成之路。理性帮助人合理区分自己的欲望，正确节制自己的欲望，要求人将单纯感性的生活变成人的生活，要求人不断追求灵魂的净化、精神的超越与个性的完善。包尔生指出，“全部道德文化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和培养理性意志，使之成为全部行动的调节原则。我们把这样一种德性或美德称为自我控制。这种德性通过独立于短暂易逝的情感之外的理性意志，调节着我们的行为。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德性规定为以目的和理想来调节生活的能力。它是全部道德德性的基本条件，是全部人类价值的基本前提，甚至是人类本性的基本特征。动物为盲目的冲动驱使，而人的特有的美德在于他的意志决定他的生活。离开了自我控制，就没有自由和个性。”^[16]

正是凭借理性的精神，苏格拉底甘愿充当古希腊城邦的“牛蛇”，对生活中的庸俗之气、不正义之风进行了有力的针砭，还积极主动同希腊人民对话，以唤醒他们沉睡的灵魂或被异化的心灵，引导其把握和了解个体真正的现实意识，激发其对美德的追求。当然，他本人也用一生践行着理性的精神，不断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生活”，坚持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对每一个道德主义者来说，理性的功能都是支持使生命超越自身的那些冲动，都是扩大这些冲动的社会性的范围与程度。因此，认为日益增长的理性是

人日益增长的道德的保障，是没有错的。我们理性的发展程度越高，我们就越能够正确地评价其他生命的需要，就越能够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动机与冲动的真正性质，就越能够协调产生于我们自己生命的冲动与产生于社会的冲动之间的相互冲突，就越能够选择有效的方法去实现我们所赞许的目的在许多情况下，理性的发展都能够增进我们的道德能力。”^[17]

德性不仅仅代表人具有行善的能力，还必须具有对于善的热爱。道德感也是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在自己的心灵深处都埋藏着道德的种子，需要能干的农夫去灌溉，让种子发芽’。需要创造‘人为的习惯’来改造人，使人真正成为人。但是，这样做并不是像禁欲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要拔除人的感情，而是把感情和谐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18] 立足于人的道德情感，激发起对善的热爱与向往，才会使人自觉地向善，形成向善的意向和态度。人的选择如果离开道德情感的力量，而单纯地依靠理性的作用，把道德认识转化为人的行动，往往会造成对人性的压抑，久而久之则会形成道德冷漠甚至道德逆反。尼布尔认为不管道德感具有什么独特的特征，重要的事实是人似乎在其道德资源中拥有一种对善的责任感，而不论怎么定义善，并且强调善的责任感是可以培养的。“像概念知识一样，善的责任感可以通过训练得到加强与扩充，也会因为长期不用而退化衰微”。一个人只有具有了向善的情感，才会选择善的行为。德性的结构包括知善、爱善与行善的三个方面。正是依托于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德性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的选择是向着人性提升的方向的。国内学者杨国荣指出作为德性的构成，情意、理性都包含着确定的道德内容，所谓行善的意向、知善的能力及对于善的情感认同，都表现为一种以善的追求为内容的精神趋向，从而德性从主体存在的精神之维上，为行为的善提供了内在的根据。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所强调的德性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德目，而是多种德目的整合体。因此德性体现的不是人某一方面的品质，而是表征着人的整个存在，体现的是一个人的整体精神风貌。德性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是整体性的存在，而不是碎片式的存在。作为涵摄主体存在的内在人格，德性构成了人的多方面发展所以可能的根本性条件。有学者指出德性的这种统一性往往以人格为其存在形态，以人格为形式，德性统摄、制约着人的日常存在，“德性的整体性与人生的整体性相辅相成、彼此互动，二者统一于生活世界中的历史实践，表征为德性人格。”德性从根本上可以保证人去探究选择的目的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目的才是值得人选择的，什么样的生活目的才是正当的，合理的。“他的生存，是不能借助于任意的手段、散乱的情感、盲目的冲动、或者一种偶然和奇想。他生存所需的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他的选择也并非任意的。这种选择的自由仅在于他是否发现这种本性，是否选择正当的目标和价值”。德性促使人去不断地反思选择的合理性何在，增强人选择的审慎性，避免人选择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现代人在选择时的不思考，不批判，不质疑，无疑给他个体的生活造成难以承受的责任。于是，现代人对责任的逃避和开脱也是顺其自然的。失去了德性的关照，人们的选择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尽管人想实现做人的尊严，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与尊重，但似乎人们却选错了方向，“人们竟然会指望发展那样一些倾向，它们摧毁了灵魂的力量，摧毁了精神的伟大，摧毁了心灵的高贵，摧毁了一切从心灵深处产生的真正的高傲和荣耀。人们竟然会指望发展自我利益、攫取金钱和好逸恶劳指望发展对财富、头衔和权力的愚昧赞赏，指望发展一种盲目的令人讨厌的服从，指望发展一种不仅不允许热情而且还迎合最厚颜无耻的顺从的焦虑和恐惧。”

不仅如此，另一方面，人的选择也是为着人的德性生成的，因为德性的生成是人对美好生活的追寻不可或缺的。“德性必定被理解为这样的品质将不仅维持实践，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中支撑我们，并且还将把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对德性的追寻就是对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此，麦金泰尔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好的生活是在寻求好生活之中度过的生活，对追寻所必须的德性是将使我们懂得更多的有关人

的好生活是什么的那些德性，我们把德性不仅置于与实践相关的情形中，而且置于与人的好生活相关的情形中”。^[19] 人性的优秀、卓越就是在追寻德性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人在追求善的生活中，生成着德性，践行着德性，也完善着德性。

只要人存在着向善之心，只要人希望追求更值得过的生活，那么人的选择就不能不依靠德性的养成。德性关涉的是人的精神生活与意义世界，实现的是个体灵魂的治理与提升，个体精神生活的追求与意义世界的构建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的德性生成与践行。不仅如此，德性还拓展了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增进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价值共契感，从而为每个选择者在世界和社会共同体中追寻更值得过的生活提供了积极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个体精神生活的丰富与充盈，推动了个体人格的完善与健全。德性是保证人追寻美好生活的核心品质。选择善的生活在德性的作用下成为可能。德性且只有德性的力量使选择成为道德的选择，向善的选择，使选择朝着人性优秀、卓越与美好的方向。

注释：

① 关于实践理性，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也强调了其在生活中的价值，他认为拥有这种德性并不意味着有如此多的可供我们实践推理的大前提的普遍规则或格言的知识倒不如说这种德性表现在一种判断能力中，借助于它，人可以知道如何在相关的许多准则中选择准则和如何在特殊的环境中运用准则

参考文献：

- [1] 柏拉图.法律篇[M].张智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2001.27.
- [2]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37.
- [3] [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93.
- [4] [美]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185.
- [5]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37.
- [6][7] [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戴扬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29,188.
- [8]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9.
- [9]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73.
- [10]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9.
- [11] [美]艾伦·布普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80.
- [12] 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M].夏镇平译.上海：三联书店 1988，70.
- [13] 黄藿.理性、德行与幸福——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M].台湾：学生书局，1996，26.
- [14]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中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187、190.
- [15] [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戴扬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95.
- [16] [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12.
- [17] [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23.
- [18] [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M].李玉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64.

[19] [美]麦金泰尔.德性之后[M].龚群, 戴扬毅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277.

Virtue Education and Choice

Zhang Fuwei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Lu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People's choice cannot escape the pursuit of goodness. The meaningful choice is choosing to be good. This made the existence and practice of morality possible and necessary. Virtue has good value. Virtue reflects the excellent and outstanding human nature. Virtue made people actively choose to do good things, not passive, and not forced to do good things. Basically, the process of virtue formation is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goodness. The life of goodness must be the moral life. Virtue made choosing possible.

Key words: virtue; lost; restore; virtue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07-11-25

作者简介: 鲁东大学心理与教育学院教师